

香港文藝設施數據庫

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成立，有助推動文藝發展。行政長官李家超也表示，當局會把握「十四五」規劃給予香港的新定位，建設成為中外藝術文化之都。

那麼，筆者認為首要任務是建立文化數據庫，透過數據庫了解目前的現況，從而精準地推出未來發展的具體方案，以及建立具體的指標。舉例說，文化藝術場地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；倫敦有一萬八千多個文化藝術場地，東京、紐約等許多城市均有設立一個擁有豐富文化資料的數據庫。然而，香港欠缺這樣的數據庫。

香港目前大部分的文藝場地由康文署管理，但在其他一些國際城市，除了政府經營的文化場地之外，也有政策鼓勵民營、非營利的藝術場地以及盈利的商業藝術場地。香港要發展藝術，需要不同類型的場地配合不同大小的表演等文藝活動。例如在東京，容納二十人的小型棟篤笑演出場地，以至容納幾萬人的大型演唱會場地皆有。

文化和體育其實都需要空間場地，而檢討香港目前的文化場地，正是首要任務。只有建設好的硬軟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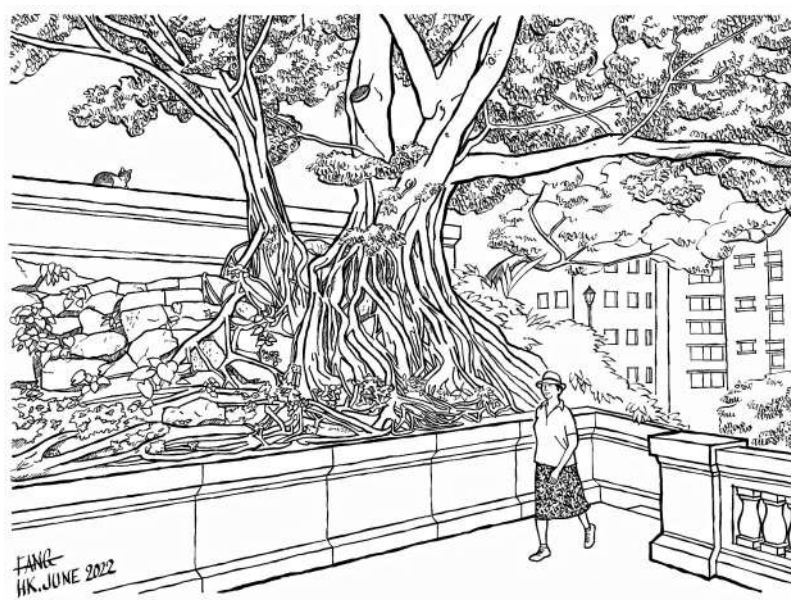
才能充分發展。因此，文化資料庫是一個重要板塊。香港總共有多少個表演藝術場地，面積大小如何，博物館空間有多少，畫廊有多少，藝術工作室有多少等等問題，都是政府需要掌握，尤其是在未來設定指標的時候，因應這些硬件數據，才能夠知道如何去發展。再如，當初有人建議西九文化區裏需要興建一棟大樓，作為藝術團體辦公排練地方，但目前這個計劃仍未被落實。

空間對於文化藝術發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在筆者看來，香港其實有一些空間可在短期內改裝為藝術空間、藝術工作室等，例如天橋底、屋邨停車場、食環署的空置街市，以及不少的空置校舍。香港現時缺乏的正是這些基本配套。再說展覽空間，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展覽館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空間，但是很多精彩的展覽只在那裏擺放兩三天便要結束。為什麼不開拓更多展覽空間？例如鼓勵商場設立展覽空間，讓香港藝術家可以有更多機會展示作品。另外，荷李活道一帶，是否可考慮推動它成為一個畫廊區，再聯合大館、PMQ等周邊的文化場所？



善治若水
胡思威

榕樹



細葉榕是一種很有香港特色的樹木。它生命力頑強，外表樸實無華，性格堅毅、吃苦耐勞，哪怕僅有寸土之地，亦能長成綠蔭大樹。

枝繁葉茂四季青，立命安身石縫中。撐起大傘遮烈日，伸出長臂喚清風。朝聞百鳥枝頭唱，夜看千家燈火明。水泥山中綠俠士，一木成林細葉榕。

文、圖：方元



市井萬象

中西合璧獅子玉

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正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當日。來自故宮博物院的九百多件文物在此展出，分為晉唐宋元繪畫、陶瓷珍品、清代宮廷生活等多個專題展覽。其中「馳騁天下——馬文化藝術」展覽頗為別致，展出一百多件來自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馬文化藝術展的眾多展品中，郎世寧的《獅子玉》不得不提。此畫屬《十駿圖》系列之一，為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（一六八八至一七六六）為乾隆鍾愛的十匹駿馬而創作。據清宮內務府活計檔所載，乾隆曾命郎世寧畫「十駿大畫十幅，不必布景，起稿呈覽」，以至於今天我們在北京故宮所見的《獅子玉》等圖，皆無布景，畫中駿馬置於絹上，狀若浮腫，極富西方繪畫寫實意味，與我們慣常所見中國山水花鳥圖等皆不同。

《獅子玉》等十駿圖如此鋪排，讓人想及唐代畫家韓滉的傳世名品

《五牛圖》。畫中五牛，同樣不着背景，僅將牛置於畫幅前景，姿態各異，造型生動。如果說《五牛圖》意在體現曾任宰相的韓滉對於農耕及農業的關注，那麼《十駿圖》則看得出滿清一朝對於射騎武功的強調。在呈現方法上，《五牛圖》重意，而郎世寧的《獅子玉》等更重形似，或也與畫家本人兼採東西的繪畫風格有關。

郎世寧生於意大利米蘭，跟隨大航海時代的船隊抵達中國傳教，於二十七歲那年進入康熙的皇宮，成為宮廷畫家。之後的五十多年，他再不曾離開北京，前後為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作畫，留下不少傳世精品。二〇一五年，逢郎世寧來華三百年，北京故宮與台北「故宮」聯合舉辦特展，這件《獅子玉》便與其他幾幅郎世寧名畫一道，借至台北故宮展出。來到中國之前，郎世寧曾在意大利學習透視法、明暗關係等繪畫技巧，進入清朝宮廷之後，他將自己在故鄉所學與中國界畫、山水、動物和肖像畫等結合，創造出追求形似兼具立體感的繪畫風格，影響了同代乃至後輩不少中國畫家。

今日所見《獅子玉》栩栩如生，毛髮細膩如玉溫潤，馬蹄甚至有金屬光澤。觀者身處畫布前，彷彿聽得見馬蹄踏地的清脆聲響。時隔三百年，得見如此佳品，全賴當年跨越國界山海的文化往來。所謂中西合璧、兼採眾長，不外如是。

◀《獅子玉》正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。



向來是一個人的私事，「書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憂樂每相親」，讀到一本好書，不像長於交際的人熱衷炫耀攀附到的權貴，而是把書當作家人或朋友，朝朝暮暮，喁喁私語。讀到一本好書，自可津津樂道，但也別奢求他人能夠與自己產生完全的共鳴。可憐淺薄如我，一度痴痴地向他人推薦自己中意的書，回想起來實在羞愧難當，始覺自己對書對人皆是一知半解。

偶有朋友請我薦書，每一次我都認真推薦一兩本我以為適合朋友性格和職業的書，外加一兩本我個人極為推崇的書。久而久之，我對這種請託和推薦逐漸有些抵觸。原因倒也簡單，一來我擔心自己本也孤陋寡聞，如此好為人師，讓自己的讀書趣味影響甚或誤導了他人；二來我覺得讀書這件事具有很強的個人主觀性，如吃飯穿衣不必每日請別人幫助出主意，書浩如海，假使不能自己尋見要讀的書，只能是尚未明白讀書的意義。自此，再有人請我薦書，我只好以久不讀書、不辨良莠為由婉拒。

大抵記得文化學者余秋雨在他的名篇《藏書愛》中發出過這樣的感慨：一個學者身後藏書散盡，等同他的第二次死亡。所言非虛。對於讀書人而言，書籍可謂其文化意義上的生命，書架和書籍營造的一方天地，外人即使涉入，也很難親近，原因無他，只在於書籍體現的是個人志趣，正如世上找不到兩片相同的樹葉，天下又何曾找到兩個相同的精神家園。真正的讀書人知道，讀書



自由談
蘇鄉

帝國輓歌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沒有誰比史帝文斯更需要回憶，這位作家石黑一雄筆下的英國管家，為了贏得他眼中所謂的「尊嚴」，不顧親情，放棄愛情，幾乎失去了一切，直至生命行將落幕，他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——這樣的人生值得嗎？

在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的小說《長日將盡》（The Remains of the Day，又譯《告別有情天》）中，主人公史帝文斯利用短暫的六天旅行，回顧了他漫長的一生，準確地講是位於牛津附近達林頓莊園工作的日子，因為他在那裏奉獻了大半個人生。為了更好地服侍貴族莊園主，他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當好管家的標準——全身投入、不徇私情。事實上他也是按此標準嚴格執行，嚴格得甚至近乎苛刻，他壓抑了個人的全部情感，可謂心無旁騖，恪守職責。

比如，當他中風的老父親在樓上溘然長逝，他強忍內心悲痛，仍十分得體地在樓下照顧着賓客，儘管他看起來像哭泣般在微笑；當主人淪為希特勒手中棋卒而不自知，他摒棄是非標準，仍視而不見地忠心耿耿伴其左右，儘管整個國家正在一步步滑向戰爭深淵；當他愛慕的女管家肯頓小姐賭氣隨口答應了別人的求婚，他掩飾如雷轟頂，仍鎮定地向對方表達恭喜後又重回工作崗位，儘管事隔多年他回憶說「那一刻，我的心都碎了」。

以上的林林總總，在史帝文斯看來都是理所當然，因為他的理想是做一名「偉大」的管家，而衡量「偉大」的標準主要取決於是否擁有「尊嚴」。他對「尊嚴」的定義是，要像同為管家出身的老父親那樣，即使面對有殺子之仇的將軍，依然能保持冷靜地提供最為周到的服務。如今他成就了理想，收穫了「尊嚴」，但除此之外，他一無所有，就如肯頓小姐在給他的信裏所說：「我的餘生彷彿一片虛空，攤放在我的眼前。」或許是命運的捉弄，某種意義上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。

對於很多人來說，《長日將盡》主要在探討人生的獲得與失去，但石黑一雄透過史帝文斯管家的身份，也為讀者提供了另一個視角，得以一窺有着古老傳統的英國主僕文化。書中多次出現對於「尊嚴」這一話題的討論，作者對此沒有預設立場，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，但人們從史帝文斯的身上，不難看出這份讓他甘願捨棄一切、卻換來虛空一場的「尊嚴」到底意味着什麼，只是史帝文斯本人沒有看透。

少女時代做過女傭的英國作家瑪格麗特·鮑威爾，就比史帝文斯看得透徹，她在回憶錄《樓梯之下》（Below Stairs）中，直接點明「主人不認為僕人是有情感、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，他們只是財產。」就算是指揮僕人的管家，也不過是鄙視鏈頂端的高配。英國歷史學家羅納德·弗雷澤在《追尋過往》（In Search of a Past）一書中說得更加直白，「僕人就是家庭的附屬品，價值等同於一件時興的傢具。」僱僕人甚至是階級體系的表現，主僕關係又主宰了僕人們的生活，給主僕之間埋下了情感雷區，雙方內心都充滿了不滿、憤怒、負疚的情緒，以及勉勉強強的責任感與義務，令大宅子裏樓上樓下兩個群體的關係變得扭曲。

史帝文斯拒絕愛情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因為晚婚是英國管家的職業特性，在十九世紀末出版的《傭人實用指南》裏，已經寫明「部分僱主不傾向於僱傭已婚的管家」，尤其跟女管家結婚更是大忌。這樣一來他們既需要抽時間陪伴家人，又會被撫養妻子和孩子分散精力和財力，不會像單身那樣費時費力地打扮自己，最關鍵是已婚管家可能會為了家人而偷竊主人的財產。當然個別僱主會錄用管家和女管家或廚娘結成的夫婦組合，這樣便可以「花一個人的錢請兩個人幹活」。即便如此，僱主還經常抱怨找不到正派的僕人，比如認為他們越來越叛逆，動不動就要挾辭職以達到漲薪的目的。

正如講述上世紀三十年代貴族和家傭的英劇《樓上樓下》主創所說，並非一提到英國主僕文化，就好像樓

下的人都痛苦、扭曲，樓上的人都邪惡、虛偽，但也絕不像《唐頓莊園》中每個人都溫情脈脈，一片歲月靜好，其過度美化貴族和階級秩序，完全忽略了那個時代存在着的深刻不平等。

而《長日將盡》僅以第三者身份對史帝文斯冷眼旁觀，通過他的一言一行將管家真實的一面攤開在讀者面前，他自以為對世界（這世界就是個輪子，以這些豪門巨宅為軸心而轉動）和「尊嚴」的理解毫無破綻，實際上錯漏百出，到頭來不過是自欺欺人，也許這正是作者石黑一雄的高明之處。他在評價這些人物時說過：「他們表現了一種殊死的勇氣，儘管他們目睹自己耗費了生命的大部分時間，只為了做徒勞的事，他們仍甘願繼續下去。問題是，生命消逝得太快。」

他有理由為史帝文斯這些管家們感到不值，因為他們引以為傲的「偉大」事業，正和大英帝國同步沉淪，就像小說中描寫的「史帝文斯步入暮年，達林頓莊園風光不再，帝國偉業一去不返。」而並不知覺的史帝文斯在小說結尾，對着夕陽說出「夜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」，恰是最形象的隱喻。



▲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《長日將盡》。

書籍能夠抵禦戰爭、文明能夠對抗野蠻，而僅僅只是一次僥倖。有史以來，被戰火夷為平地的圖書館和焚為灰燼的書籍不計其數，故此，那兩排倖存的書架才越發顯得難得，以致被攝入照片、載入史冊。這不僅僅是提醒人類警惕文明的不堪一擊，還彷彿證明，即使剛剛從磚塊瓦礫中灰頭土臉地站起來，讀書仍能體現人類的最後一點風度。由此，我們對書籍的期待也更趨平和與務實：書籍不能蕩滌所有的醜惡，消弭所有的隔閡，止息所有的暴虐，啟發所有的愚昧，安慰所有的孤獨，撫平所有的惱怒，但至少是一種有效的選擇。

讀書，前人從來自覺。「發奮識遍天下字，立志讀盡人間書」，這是少年蘇東坡的雄心壯志。「讀書謂已多，撫事知不足」，這是中年王荊公的反躬自省。「燈前目力雖非昔，猶課蠅頭二萬言」，這是老年陸放翁的力衰不怠。

說到底，讀書是一個人的人事，本當自覺，何須薦書。